

## 北宋

## 一朝何以无和亲之分析

李 静 张杨娟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200)

[摘 要] 和亲之策源远流长,自始于西汉之后,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奉行,而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确起到了阻止战争、维护和平的积极作用。但北宋王朝在和诸少数民族政权长达一二百年的对峙中却无一例和亲。

[关键词] 北宋 和亲 原因

和亲,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故和亲又称和蕃,蕃通藩,藩者,篱也,喻指边地、边廷,由此可见一斑。自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西汉之后,和亲逐渐成为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为历朝历代、诸民族统治者所奉行。不论是两汉、三国、南北朝还是隋唐、辽夏、蒙元清,每一朝皆有数例、数十例,甚至数十例和亲。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宋在对外关系中可以以金帛许和,但决不许和亲的这样的理念呢?

#### 一、北宋一朝无和亲之分析

和亲之策为历朝历代、诸民族政权所接受并奉行,那么至北宋一朝,不可能没有人提倡用它来处理宋与西夏、辽等民族政权的关系的。翦伯赞先生说“把女人当作历史的弹簧,这是和亲政策的实质。但是哪里需要装上这种弹簧,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使用这根弹簧,却不是任意的,而是决定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情况”,通过对宋朝历史的综合了解,以及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具体交往情况,笔者认为宋一朝无和亲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1、民族偏见

马大正在《中国边疆经略史》中也讲到和亲发生的两种历史条件:一种是静态的硬性的历史条件,包括社会制度(封建制或者奴隶制)和民族矛盾的不可调和。另一种是动态的软性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的分裂状态,以及有无强烈的民族偏见。

和亲之策正式运用于西汉初年,汉天下初定百业待兴,为争取难得的和平汉君臣更多的是从实用的角度思量和亲与否,就连汉武帝日后绝亲匈奴之时,大臣们的讨论也不曾提到国家体面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战和的利弊。这是因为这时汉作为一个民族刚刚形成,尚没有形成很强的我贵彼贱的民族偏见。但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统思想日趋完善,且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汉民族的民族偏见不断增强。东汉时,对强烈渴望和亲的匈奴东汉统治者连个宫女都不愿赐给单于;两晋均没有和亲发生,认为夷狄“法诉诡异,种类乖殊”“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sup>[1]</sup>,和亲之意全无,以至于最后发展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威逼长江,建康“内外戒严”、“民皆荷担而立”<sup>[2]</sup>的情况下,宋文帝对拓跋焘提出的“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刘骏),自今匹马不复南顾”的和亲要求,以“师婚不祥”为借口而“许然而隋唐时期却迎来了和亲的一个高峰期,这并不是说汉民族的民族偏见减少了,而是由于这两个王朝的建立者、前期君主都具有少数民族血

统,如唐高祖之母独孤氏、唐太宗之母窦氏、唐高宗之母长孙氏。所以他们的民族偏见相对比较淡薄,因此唐前期积极与突厥、吐谷浑、铁勒、吐蕃、契丹、奚等少数政权和亲。

汉以来民族偏见各朝各代均有之,民族偏见淡薄的唐朝也不例外,如唐僖宗时面对南诏的和亲要求唐内部意见不一,主战派的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就始终固执的认为:“(南诏)蛮蓄鸟兽心,不识礼仪,安可以贱隶尚贵主,失国家大体!”<sup>[3]</sup>。那么宋作为汉族建立的中原封建王朝对其他民族政权有民族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但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王朝的民族偏见是很强烈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宋王朝作为中央政府所拥有“正统地位”的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正统观念是古人常以之评判某一政权性质及其是否具有合理标准,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北宋之前的诸民族政权不论建立的国家如何强大繁荣,其心理上始终以汉族及汉族政权为正统,但北宋王朝时期这样的观念受到了来自周边其他民族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以辽、西夏为例说明。辽乃是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国家,其在正统观念上,与十六国及南北朝时先后在中原建国的“五胡”不敢自视为正统的观念不同,它自称契丹出自炎帝,与汉族一样同为炎黄子孙,理直气壮的以华夏民族自居。而其德运则承于后晋,为水德,和宋受后周禅一样,都是正统的华夏王朝,所以后来一直和宋以兄弟之国、南北朝相称。当然这些都是契丹辽国人自己的看法,宋人对此是相当不屑的,如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还是把辽国列入《四夷附录》中,再如澶渊之盟后宋人对辽国的兄弟相称、南北朝相称都是十分的不满,认为辽始终为狄夷,岂可与宋首足并处?西夏在这方面也不示弱,其虽然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实际上多次的战事都是由于其不愿向宋称臣,不承认宋的正统地位引起的,如元昊废掉了唐宋的赐姓,改用党项姓,并自称为“青天子”,以别于宋帝的“黄天子”,还有党项贵族们心中一直想的建立强大的党项国家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党项民族独立意识的很好体现,他们认为自己和汉族一样,是平等的,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宋人始终视之为狄夷的民族,政权纷纷以正统自居,宋人虽然不肖,但是内心也不可避免的有了些正统的危机感,反而更加竭力的撇清与狄夷之邦的关系,严防以夷变夏,因而表现出更加强烈地汉民族意识。再加上汉文化在当时诸多文化当中占据的巨大的文化优势,以及宋王朝在经济上绝对的发展优势,这些辽、西夏等民族无法比拟的优势使得汉民族心理上是很得意的,心理上对于他民族的贬低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民族偏见空前的得到了发展。

其次,晚唐与回纥的和亲使得和亲声名狼藉,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宋庭君臣来说尚记忆深刻,加之宋朝的上层统治者中没有少数民族血统,完全接受了历史积累下来的民族偏见的沉淀。

再次,宋没有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治格局,民族融合程度远不如隋唐时期高,反倒是诸多民族政权各自为政,甚至很多民族政权间为了争夺领地和财产厮杀不已,比如西夏与吐蕃角厮啰政权,这必然增加民族间的敌对和仇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了解,包括汉族与诸少数民族之间,所以汉民族的民族偏见比较强烈一些。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的加深了宋时的民族偏见。

## 2、理学思想

理学兴于北宋、成于南宋。理学兴于北宋的历史背景是:东汉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宋建立之后儒学的独尊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恢复。因为统治者发现佛道更有利于其统治,佛道宣扬富贵在天、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让人安于天命的思想,儒学面临着如何革新以更好的适应统治者的需要的问题,而佛道也有自身的隐患,唐武宗灭佛并不遥远,如何使其教义世俗化、伦理化,不再重蹈这样的覆辙,也是佛道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中叶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合流,而理学就是三教互补的结果。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随之兴起。夷夏之防防的是以夷变夏,保卫的是中央汉族王朝的“中华文化传统”,长期以来的中原文化优势意识必然会使他们从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所持有的文化是主流的、正统的,其他民族皆是落后的、低下的、野蛮的,视之为异类,于是就产生了心理贬低,这是基于文化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优势文化常见的现象,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意识基础上的对异域与异族进行的集体无意识的贬低行为。这种集体无意识反映在民族交往上就是民族歧视,并极力撇清淤少数民族的关系,好以此维护本文化的纯洁性、正统性。如宋人谈到女真时说“今女真性刚狠,善战斗,茹毛饮血,殆非人类”,以此来达到“尊王攘夷”,以夏防夷的目的。朱熹就认为“中国结婚夷狄是‘自取其辱’”<sup>[4]</sup>,因此宋在与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议和时,银、绢不惜多给,但和亲皆拒之。

## 3、经济贸易发展的产物。

从某种程度上讲,宋王朝确有不如汉唐的方面,如统治疆域大大缩小,对外战争屡屡败北,屈辱的金帛换和平等等,所以人们提起宋往往都会用“积贫积弱”来形容,“积弱”是事实,但宋并不贫,相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高。北宋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科学文化相当先进的封建帝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大批的良田被开发出来,大大增加了宋的垦田数,使宋的垦田总数目在7.2亿亩左右<sup>[5]</sup>,这一数额不仅在汉唐盛世没有达到,即便后来的元明两朝亦未超此数;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种子、肥料的广泛利用,经营方式的改进、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使得宋的粮食产量相当的可观;农业、手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扩大和物资交流创造了条件。北宋时城市坊市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不再像唐那样商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市营业时间也大大开放,几乎是通宵达旦。除此之外,在原来北方的“集”和南方的“墟”的基础上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草市和镇市,遍布各地。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宋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并出现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和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截然不同,北宋政权建立之后,积极鼓励对外贸易“太宗雍熙四年,特前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国勾招进奉”<sup>[6]</sup>

并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和秀州设立过市舶司。据记载当时和宋海上通商的国家除了近处的高丽、日本外,还有大食、大秦、天竺、交趾(越南)、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细兰(斯里兰卡)等等。

首先宋朝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对外交往中频频用金帛解决各种统治危机或利诱其他民族政权臣服。澶渊之盟是典型的一次用金帛换和平的盟约,根据澶渊之盟双方达成的协定,辽尊宋为兄,但是宋每年要向辽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的增币事件也是如此,为了拒绝辽兴宗的和亲请求,宋主动提出金帛的替代方案,使得岁币总额达到五十万两,1044年宋夏和谈中宋庭咬定一条原则不放,那就是:夏必须向宋称臣纳贡,取消皇帝称号,为此宋付出极大代价: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国土,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锦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等等。这些岁赐都不是笔小数目,但是宋却屡屡适用之,那是因为宋负担得起这些财物,不然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金帛解决问题。

其次,宋王朝利用其经济高度发展的优势,在互市贸易中占尽先机,并以此作为逼迫和引诱西南西北的诸少数民族政权就范、归服宋朝的一种经济手段。以西夏为例,“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它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sup>[7]</sup>这段文字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明。而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军事上不能和宋相匹敌时,仅在名字义上向宋称臣就能获得大批的岁赐,并通过和市带来非常可观的好处,且不损害他们的独立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会选择臣服宋庭。西夏从李继迁到元昊,总是交互利用战争与和平的手段从中原地区获取巨大的利益。而宋更以和市作为压服西夏的一个经济手段。在这二者的背后隐藏的是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和诸民族政权统治下的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 二、结语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纵观以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一朝在没有和亲发生。而强烈的民族偏见、正统理学思想、经济的高度发展三者共同作用是和亲在宋朝没有成行的主要原因。民族偏见是基础,它使得和亲的观念被排挤到了民族交往方式的边缘,理学是推动力量,它把汉族的民族偏见推倒了相当的高度,从而使得金帛换和平的替代方案能够深入宋朝统治者的内心,因为结婚狄夷是奇耻大辱,是有伤国体的,而多给金帛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而经济的高度发展则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替代方案,是的金帛替代和亲的方案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 参考文献:

- [1]晋书·卷56《江统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013页。
- [2]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第三九六零页。
- [3]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中》,第六二九零页。
- [4]朱熹·楚辞集注·转引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92。
- [5]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0。
- [6]《宋会要》转引《粤海关志》卷二。
- [7]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零《论西夏札子》。

作者简介:李静(1963-)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学和民族心理学;张杨娟(1980-)女,河南新乡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心理学。